

我的

留学记

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光明日报出版社

〔日〕

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

译 著

我的留学记

(日)吉川幸次郎 著
钱 婉 约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留学记/(日)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9

ISBN 7-80145-154-6

I. 我… II. ①吉… ②钱… III. 汉学-研究-日本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969 号

我的留学记

(日)吉川幸次郎 著

钱婉约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8316925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9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45-154-6/G·77

定价:15.00 元



吉川幸次郎先生

译者前言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一生著述等身,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他一生为学,近者追随其师狩野直喜的治学风范,远者景仰清代乾嘉学者的精神性格。在中日战争的年代里,他远离弥漫全国的军国主义和狭隘的国粹主义气焰,埋首于学术研究。晚年以“城市儒者”自居,表现了对于中国儒学文化、对于中国文学“日常性”的终身向往。在这一意义上,他的学生高桥和已称他的文学研究是“儒家的文化研究法”,其学术热情背后是“人格化的哲学”。他的著作有若干单行本问世,后被编成《吉川幸次郎全集》。

现在呈现在你面前的这本书,由译者编选而成,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我的留学记》,这是吉川先生晚年对自己1928~1931年间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时的回忆。在“留学之前”部分,谈到了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日本的一般遭遇:“我在三高时,想研究中国学问,就有人反对,甚至有人对我提出忠告说:‘你还是不要做那样的事吧。’……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到其它学生的斜眼而视,打个比方说,似乎是大学里的被压迫民族。”这是一个普遍蔑视中国的时代。而作者吉川先生有幸就学于与上述气氛完全不同的、在当时日本可谓特殊的京都大学,那里不仅有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一流的开创性的中国学家;而且,以这些中国学大家为中心,形成了欣欣向荣、群星璀璨、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在这种双重的氛围中,吉川先生怀着对中国无比的向往和探究之

心,来到了北京大学。他的身份是旁听生。

中国文字声韵概要 马幼渔(裕藻) 3 学分

经学史 马幼渔 2 学分

中国文学史 朱逖先(希祖) 3 学分

中国史学史 朱逖先 2 学分

这是他第一年旁听时的课表。而这位旁听生在北京、在江南耳闻目接所得到的留学印象,要比听课丰富得多。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周作人……当时北大文学院占绝对优势的浙江籍系派的教授群像;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的不同风范;南京中央大学黄侃教授给予他的深深感动;以及 20 年代末北京没落旗人的营生、琉璃厂书店业的繁荣和书店老板的敬业乐业、江南风土人情的醉人……,这些都因了一个充满探究之心的外国留学生细腻而别致的感受(这种感受或许还加进了回忆者事后的理解),而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

二,《中国印象追记》,这是作者在归国后的四五十年代陆续写下的追忆性随笔、小品,包括情感性的怀人篇什和学理性的评论篇什。“我对 C 教授家的事,知道的并不比以上更多,但却对他家充满敬重之情。因为那是一个只有在特定的地域上,经历了好几代文化传承才能造就出来的、对他人充满善意的尊重和信赖的家庭。但是,战争吹散了一切……”;“琉璃厂是北京的古书店街,来薰阁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学时很相熟的古书店,其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若干年后仍能出现在作者满含敬爱和怀恋之情的笔下的中国人物,往往都是身上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那种人,从这里也可以洞察吉川先生在战中、战后那段中日关系最险恶的阶段里,仍是多么地深爱 and 怀恋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绝不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怀旧主义者,作为一个成熟而睿智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状,都努力去寻求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解释和分析。他对于

1949年以前中国城市与农村存在巨大的差别,以至于呈现“两个中国”的分析,不同于一般的纯粹的阶级分析,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联系中国历来的经济制度、统治政策、文化生产、思想信仰、农民起义等等历史状况加以理解和诊断,从而提出或暗示自己的论断。写于1949年8月的《两个中国》在结尾处说:“中国的农村,如今第一次改变了向来不合理的信仰,而在合理的信仰下团结起来。这正是如燎原之火的中共的活力的源泉。但是,如疾风扫落叶般席卷农村的中共,现在正要进入城市。城市生活就是城市生活,有其非常坚固的根底。对此,应怎样对付呢?中共是否会像明太祖那样,自觉地改变自我,走向城市化的方向?”在这里,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力也造就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洞察力。这一部分中,读者还可以看到作者关于“中国人的法律观”、“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国人的日本观”等等的观点,这些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论述,从相关的专业角度看,或许已不新鲜,或许也不够深入,但这一则反映了作者当时对于中国的认识,一则还与他对中国文学的独到评价互为表里。

三,《中国文学论》,这是作者关于中国文学总体性论述的若干篇论文,以使专业的或非专业的读者,大致了解这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中国文学观。作者论述中国文学现象,往往是超越出文学史的范畴,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探讨,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厚修养,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文化的”的文学史研究原则和方法所带来的独特见解。诸如作者指出中国文学的两大特征:一是内容上的反对虚构,注重实际经历和人生的“日常性”,一是形式上的十分注重语言表现技巧。而这两大特征多少与中国人缺乏宗教意识、注重现世人生的文化特性相关联;作者又用“希望——绝望——希望”这条线索来体现中国文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读者勾勒出“希望的先秦——绝望的三国六朝——更高层次的希望 of 唐宋”这样的文学精神发展史。诸如

此类的论说,对作为文学史外行的译者来说,真是既新奇又颇受启发。

中日之间,进而言之,异民族之间,正如吉川先生所言,需要“互相真正地了解对方,……真正的了解对方是了解对方的本身,并且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所谓友情必须有尊敬,而尊敬正是了解了对方与自己的相异之处才能真正产生的。”就这一点说,本书所体现的吉川先生对中国所抱有的热烈的探究之心和理解的尊敬之情,不正为我们树立了中日间达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的良好范例吗?这是我自己在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感悟最深的一点。

钱婉约 写于1999年3月22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3)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3)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6)
京都学界与清末古典学者的接触	(8)
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交往	(10)
被中国文学的“日常性”所吸引	(13)
清朝的学问和欧洲近代的思想	(17)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力行	(21)
毫无做作的人道主义和纤细的魅力	(24)
中国研究在京都大学的位置	(26)
对现代中国的关心	(28)
了解中国的一切	(30)
初次到中国：江南的辉煌和富裕	(33)
 留学期间	 (38)
种种幸运	(38)
到达北京之前	(40)
延英舍——寄宿的日常生活	(43)

整日埋头于语言学习	(46)
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48)
张作霖的北京撤退——北京大学的复兴	(51)
转变期的北京大学	(53)
大学、学派、学者——激烈的对立	(56)
黄侃给予我的感动	(61)
与书店打交道 在北京大学听课	(65)
剧院·饭店·名胜古迹	(69)
到江南——我被当作中国人	(73)
留学所得收获	(77)
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80)

二 中国印象追记

雷峰塔	(87)
C教授	(91)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95)
琉璃厂后记	(98)
中国的警察	(102)
南京怀旧绝句	(105)
高邮旧梦	(110)
《雨窗倚枕集》和我	(115)
柳絮漫话	(118)
随笔三篇	(122)
法隆寺的松	(126)
中国思想史上的人	(129)
中国人与法则	(131)
中国人与宗教	(135)

两个中国——中国的城市和农村·····	(138)
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	(146)

三 中国文学论

中国文学史之我见·····	(167)
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	(179)
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人生观·····	(192)
中国文学的政治性·····	(197)
史传的文学·····	(206)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210)
中国人的幻想力·····	(213)
中国的文学革命·····	(216)
后记·····	(224)

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先生最初虽然是在入大学前就到上海旅游过一个月,作为留学生在北京,则是在1928年即昭和三年先生25岁的春天,到1931年即昭和六年先生28岁的春天这三年间,留学结束后,又往江南转了一圈,然后回国。这期间所接触到的民国初年学界的情况,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等,如能给我们后生讲讲,将是十分有益的事。今天获得这一机会,想先请先生谈谈留学之前的情况,即先生是怎样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留学之前日本学界的有关状况等等。首先从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学谈起吧。

那时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有三种讲座,持续至今仍是这样,即中国哲学史、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以及东洋史学,这三个讲座也可叫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毕业的学生,原则上都必须到中国去留学。

因为这三个学科的毕业生很少,所以都去留学,首先有这种可能性。其次,做中国的学问不可以从来未去过中国。这在最近以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河野所长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团一行在中国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所反映,据朝日新闻社刊出的座谈会记录《中国纪行30日》中,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中国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我是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入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1926年即大正十五年毕业。毕业后去中国是既定的计划中的事,所以说,留学在那时是普通的事情。

当时,许多人能去中国留学,还因为大学里有某某人的基金。如上野奖学金,不是朝日新闻社的那个上野,而是京都的一个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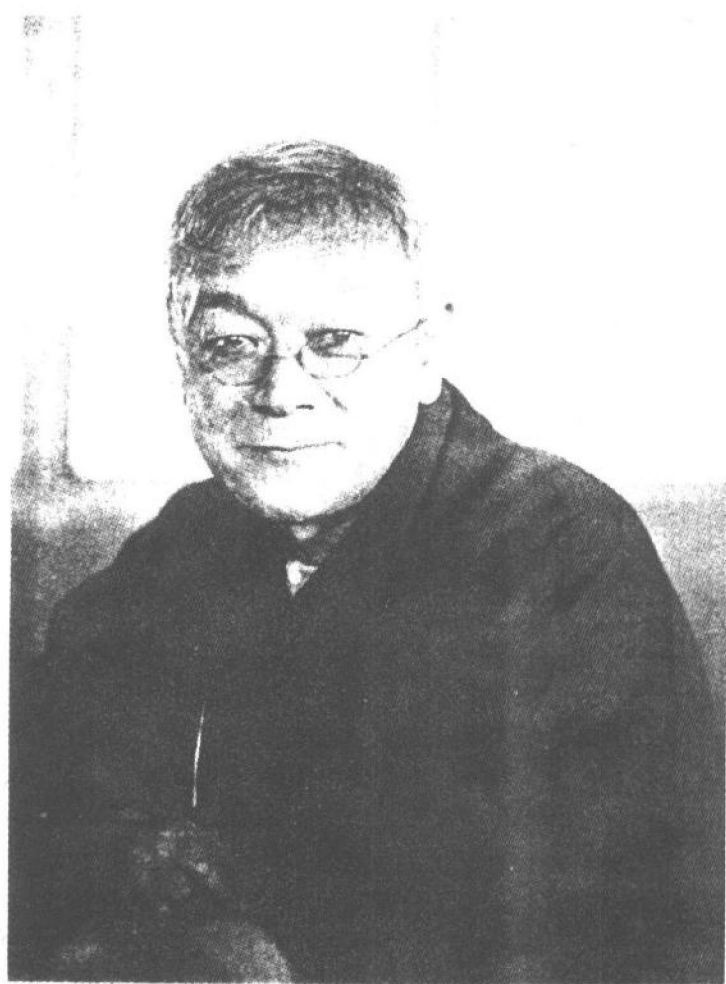
钱的上野，他在大学校方存了值当时钱的十万元，用这笔钱的利息正好可经常供一到二人到中国——主要是北京去留学，我就是得了此项奖学金而去中国的，在我之前有佐藤广治君，在我之后有木村英一君、小川环树君。此外，还有得文部省奖学金去留学的，在我之前有小岛祐马，与我同时有仓石武四郎。还有靠东亚考古学会的基金去中国的，如出身于京都大学，最近刚去世的水野清一君、如田村富造君。

所以说，在当时，做中国学问的人留学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东京大学方面的情况，我不是十分熟悉，但也有增田涉君、松枝茂夫君等人，自费去中国留学的。

京都的学风是取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这种研究的基本态度，在当时的日本中国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这种治学态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两位先生采取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对江户汉学的反叛。江户时代的汉学是把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其原因从消极方面说，是因为锁国，没办法；从积极方面说，江户时代的汉学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但总之，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须是一种新的学问。这两位先生都是生于明治前后，成长于明治中叶，那时的日本学术界，在广泛的意义上，有一种历史学的倾向，即对已认识的事物进行再认识，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成长起来的。任何现象都必须追寻它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并不好说他们自己意识到多少，但先生们学问的根基即基于此，是没问题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即京都大学一开始，就是本着与东京大学不同的学风而开办的。特别是文学部。最初设置京都大学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易流于独断专行，必须营造一个它的竞争者，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当时政府方面有以西园寺公望为中心的主张者，而民间方面强烈主



内藤湖南先生

张的无疑是内藤湖南先生。如果看了筑摩书房的《内藤湖南全集》，就能知道，当时先生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主张必须在关西

建立一所大学以与东京大学抗衡。此外,在内藤湖南先生,正如刚才所说,他是想纠正江户时代汉学的不正学风的,而这在东京大学的汉学科中并没有充分的体现,所以,先生在来京都大学前十分强调这一点。

所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在任何方面似乎都是本着与东京大学不同的方向来进行学问研究的。另一表现是,如西洋文学,东京大学当时是聘用外国人教师的,开始时全部是外国人教师,后来渐渐增加日本人教师。但是在京都大学开办的明治三十年代,东京大学还留存着外国人教师,而京都大学外国文学就一个外国人也没聘用,全部由日本人自己担任,如藤代祯辅、上田敏等。如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也是在反对东京大学井上哲次郎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活力的一个哲学流派。在中国学方面,这种倾向十分强烈,像我们这班人,就是在不要输给东京大学的意气中成长起来的。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但那时,有盐谷温到湖南长沙,并与叶德辉接触之事。这是东京大学的新倾向,是否意味着东京大学有什么新的消息?

不,作为留学生到中国,也是狩野直喜先生为早,他比盐谷温要早10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中国的,最早有两人,一是东京大学的服部宇之吉,一是狩野先生。义和团是在1900年吧,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去的中国北京,一到那里,正赶上北京笼城^①。这在服部宇之吉的《北京笼城日记》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他们两人与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家的古城贞吉,当时是新闻记者,都被包围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内。这就是文部省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留学生。此后,才有成为大学助教授的人,可以由文部省派遣去中

^① 笼城,指因被敌人包围,困陷于城中的情况。